

【宗教与社会】

## 管制与因应

——出土文物所见汉代宗教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

刘 克

(南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南阳 473061)

【摘 要】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有一批宗教题材的画像和铭文,为考察早期宗教、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和消除以前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体现了宗教管制与宗教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说明宗教是人的重要精神需求,不能长期受压抑或得不到满足。汉代只允许儒教独存而其余全被罢黜的宗教管理模式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宗教管制目标,宗教信仰方面的垄断并不能导致其他信仰无法存身。宗教高压不能改变人们信仰的内容,只能改变人们信仰的方式。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降低人们的宗教热情,当儒教不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或不能符合人们的口味时,信徒便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限制进行超越。

【关键词】出土汉画;宗教管制;信仰形式;宗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01-0118-10

汉代宗教既是宗教史和两汉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也是众多学者近年来特别关注的前沿热点。在这片热土上,尽管思维光新、形制厚重的佳作层出不穷,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早期资料匮乏且其来源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开拓,所以对在汉代特殊的宗教管制机制下宗教与官府、信徒、政治、社会权力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多重复杂互动情态却不甚了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早期宗教现象和宗教活动的真相,使相关的研究显得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完善。最近,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我们在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一批反映早期先民宗教信仰内容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我们考察早期宗教、社会与权力关系的总体态势和消除相关研

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表现宗教信仰题材的汉画,在豫皖、齐鲁、苏浙、晋陕、川滇等地均有出土,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汉画所反映的汉代管制机制、宗教管制效果和社会对相关管制所作的反应等,较之正史显得更丰富、真实、细致、直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受宋人郑樵“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sup>[1]1825</sup> 隽语的启发并针对当前学界在汉代早期宗教研究上的薄弱环节,本文意欲从与两汉相融的视界,探赜索隐,抉要发微,在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相依互动中对汉代早期宗教信众动态因应权力的复杂多层性行为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归纳,管窥蠡测之处,还望方家赐教。

【收稿日期】2013-09-29

【作者简介】刘 克(1964—),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宗教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土汉画中早期宗教、神话资料的勾稽整理与研究》(批准号:08JA730006)。

##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和儒家宗教化努力虽然为刘汉王朝提供了统治思想,上层文化也得到了纯洁,但一个极端功利化的政策,以官府绝对的权力是不可能将那些不见容于官方的信仰完全逐出社会舞台的。在这种纯行儒术、士重师传的单一格局严重限制大众的精神需要的情况下,一旦儒学宗教化的努力惨遭失败,或者褪去了斑驳华彩,其提供的思想和教条成为价值荒芜的童山,不能贯通万家、弥纶群言时,很多人,包括统治者在内,便会将灵魂从名教中撤出而投放于其他宗教的神龛以避弊自救。“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借口将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是出于这个原因,武帝用道教意味颇浓的太初、太始做年号并热情不减地封禅、慕仙和建筑承露盘接天水以谋求长生是出于这个原因,宣成二帝爱好神仙,在道家的虚幻之境中几乎丧失判断人生祸福的理智是出于这个原因,王莽崇鬼敬神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是出于这个原因,明帝求佛后,《后汉书·孝明皇帝纪》载他“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是出于这个原因,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是出于这个原因,历朝历代都奉行“里表法里”,“王霸道杂之”的统治术更是出于这个原因。为满足个人宗教需要,甚至在政治上不计后果,皇帝还常常以自己的行动挑战官府的限制。东汉晚期,灾疫肆虐,民不聊生,早期道教所倡导的灾异论与终末说甚嚣尘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道教中富有救世法力的教主黄帝和老子在这一众声喧哗的鼓噪声中也成了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崇祠对象。皇帝出于跟起事者争夺通天神权以威厌民众造反气势的需要,不仅有亲近道教、任用道士的荒唐之举,而且还模仿起义首领自称“将军”的做法而自命“将军”。如哀帝面对内外交困的政局,为安抚天下,不仅对鼓吹经学的儒生实施残酷打击,而且还听从早期道教传布者夏贺良之言进行改元易号。桓帝延熹八年一年中先后两次派遣中常侍左悺与管霸去苦县祭祀老子。等不及一年,延熹九年七月,又急不可耐地

“祠黄、老于濯龙宫”。“将军”一词,在早期道教的知识谱系中具有受天帝派遣前来拯救民众于倒悬的意蕴。灵帝迫于义军凶焰,把祖训置于脑后,不仅于中平五年自称“无上将军”,“耀兵于平乐观”,而且还举行道教仪式,接受道士襄楷的思想。据《后汉书·襄楷列传》载,“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迫不及待地要征用襄楷,希望此人在皇帝跟民众争夺道教神权与控制权的斗争中,能为皇帝出力。后汉诸帝在人心浮动和群情不安之际,对道教及道教高士所采取的默许、纵容和崇重行为虽然有政治考虑的成分,但皇帝的这种公开的违规行为成为道教教法灵验的证据,极大地抬高了早期道教的地位,使朝廷内外和贵族豪门中出现了一大批死心塌地的铁杆信徒。君如此,王自然不肯示弱。《后汉书·楚王英传》载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戒三月,与神为誓”。由于早期道教所宣扬的成仙长生思想甚合朝野上下的口味,所以非但没有罹遇被罢黜的命运,反而一直受到权贵们的赏识和提倡。社会上的一些人更是在这种沸反盈天的热闹场景中为着各自的目的而装神弄鬼,上蹿下跳,炮制出形形色色的话语谱系,并试图以此来影响皇帝。据《汉书·李寻传》、《汉书·郊祀志》和《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载,成帝永始元年,齐人甘忠可为皇帝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顺帝和桓帝时,琅琊宫崇、齐术士襄楷分别为皇帝进献《太平清领书》,矛头直指儒学的合法性问题。有些崇儒之士干脆脱掉了儒学的外衣,祭起了道教的大旗。如元帝时缙江侯江仁看破红尘而弃官随方士修仙,成帝时给事黄门郎杨雄流露出对“听素女清声”<sup>[2][23]</sup>的极度向往。这种社会风貌和文化精神说明,独尊儒术之举未能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外的信仰像董仲舒所希望的那样把它们给“绝”掉。

当儒学不足于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一些智者为了个人情绪的宣泄和诉求的宣示,便会自动进入儒教以外信仰那深广多面的精神资源中求仁责善以慰藉心田。巴蜀浓郁的巫鬼文化氛围为早期道教的滥觞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严遵,成帝时著名学者,“专精大《易》,

耽于《老》《庄》,”<sup>[3]120</sup>首开巫术于道家学说二位一体的先河。在他的影响下,修黄老、通经纬、明经术和习图讖成为巴蜀之地的一大社会景观。此风所及,巴蜀为之风移俗易,隐而不仕专务黄老者代不乏人。如杨厚原为朝廷侍中,退隐后,“归家遂修黄老”;大将军梁冀秉权,“自退去”而修黄老,授门徒三千;张陵于巴郡江州任上挂印而去龙虎山筑坛炼丹,后入鹤鸣山学道,造作符书以佐民度厄御灾,颇得乡里百姓信任。冯颢为顺、桓年间越雋太守,史书上说他“修黄老,恬然终日”。至于折像、杨宣等蜀地道门才俊,也均是有名的方术大家,其神通道亨十分了得,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有着详细记载。除此之外,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也以道家思想为依据,旁征博引,以旌旗蔽空之势,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击得锋崩刃碎。以上这些文献资料,无疑成为汉代早期道教活动和道教影响的有力证据。

贵族豪门的思想和行为不仅在源头上影响信仰的格局及其营盘的机制,其所引领的社会风潮又可能在实践层面引发更加激越的蹈袭气象。两汉强大的道教潜流一直奔涌不息和贵族豪右墓石上雕刻大量道教的画像便与权贵们的信仰偏好不无关系。这个时期道教题材的汉画是比较多的,在山东嘉祥齐山汉画像墓、枣庄市山亭区冯卯乡东汉画像墓、四川新津汉墓石函和山东嘉祥纸坊镇汉画像墓,道教大神老子像以及所象征的汉代道教仪式被大量刻绘在墓室中<sup>[4]</sup>。由于金液九丹能够“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sup>[5]75</sup>,所以在四川新都东汉墓和长宁七个洞 5 号东汉墓都刻绘有炼丹图和道士图。如果说炼丹对家财的要求较高而不易实现的话,符篆主要以咒语、神水、符铭为人攘灾避邪,因花费不大而颇得信徒欢迎。因此,符篆画像在东汉墓室中也有很多出土,如洛阳邙山东汉延光元年墓就出土有绘着道符的解注瓶<sup>[6]</sup>。以上这些道教内容在汉画中的出没与游弋,说明即使在官府排斥打压道教的险恶环境中,道教也并没有绝迹,道教对生死大事的处理和对人生意义问题的解析都分别被当时的人们看作了乐境和特殊犒赏。由于这些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不少人宁肯遭受刑罚

和挂印弃官,也不肯放弃道教信仰。

佛教的到来是汉代宗教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激变,它的出家弃亲、剃发毁容、绝妻失嗣等都因触犯了传统观念的禁忌而跟儒家伦理纲常产生着尖锐的对立。因此,佛教自传入后,虽然也曾得到过桓帝刘志、楚王刘英等人的崇拜,但由于它“伤天害理”,“践踏良俗”,与儒家的思想要求格格不入,有着《后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好大不经,奇譎无已”弱点,所以一直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恪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遗教且严守夏夷关防的文人士大夫对它往往不屑一顾,“俊士之所规,儒林之讨论,未闻修道佛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仁人君子也不忍耳闻,《牟子理惑论》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之。”<sup>[7]19</sup>认为佛教无益于人生社会的地方不可胜言。因怀疑其包藏祸心、来者不善,所以官府针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也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汉人皆不得出家”<sup>[8]25</sup>。这些言论和政策对佛教融入中土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与佛性论能帮助人实现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解脱和超越,佛教的四谛法对世人的悲怨苦难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佛像的施无谓印对汉代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而言也具有“能施一切众生安乐无谓”的法力,所以官府对佛教的管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人们对于佛教的归信。针对弱小的佛教甫入中土时所处的这种弱势地位,释门僧徒模仿西汉中期以后神仙方术的做法,悄然潜入民间,跟神仙方术处在同一个运作系统中,在蹈迹承响,沐浴黄老仙道、偶像崇拜的经验的同时,又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和征程,借鉴神仙方术的生存方法,积储经验,以一种有因有改的灵活方式传道布法,机智地跟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学竞争信众。这种机智的竞争方式,从出土佛教文物来看,就是习说的“仙佛模式”。所谓“仙佛模式”,指东汉人以羽化登仙的神仙为范本来创造佛像的模式。大约到 3 世纪末,随着来华高僧日众,佛像粉本日增,以犍陀罗模式为主的佛像才彻底取代了东汉的这种仙佛模式。最早的仙佛模式铜镜为洛阳孟津县出土的和帝永元五年“老子浮屠铜镜”<sup>[9]4</sup>。仙佛画像位于铜镜正面,老子戴三角形小冠,盘坐于椭圆形坐垫上,两位胡跪仙人分

列左右,其左是老子的六马安车。浮屠像与老子像对置,浮屠戴莲瓣纹宝冠,身穿交领衣,袖手盘坐于方形垫上,垫前放一支莲花,两位胡跪仙人分列左右,左侧为浮屠的四马安车。构图与老子像相似,表达的应是浮屠说法主题。这种“仙佛模式”还见于四川彭山166号东汉崖墓出土的陶钱树座上的佛像、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钱树上的佛像和昭通曹家老包元和元年崖墓佛像、重庆丰都槽房沟延光四年9号砖室墓佛像,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为抗击来自官府和儒家的压力而采取的避强图存谋略。但是也应看到,虽然佛教初传时期曾经遭受污名,官府也明确要求人们远离该教,这一时期的佛教信奉者那谋求自强的激情里还挟裹些忙乱和慌张,缺乏勇往直前的自信与乐观,但是,佛教画像能够在汉墓中与仙道合脉丛见,除反映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因在中土与儒的仁和之道及道的虚静之道高度契合而被民众容纳之外,也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当人们发现官府提供的信仰品种跟自身的信仰需求不相符合时,为了宣泄和表现个人的心绪、期待、想象而不肯放弃儒学以外的佛教信仰,机智开展信仰活动的事实。

实事求是地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治的推行所导致的儒士集团力量不断强大和儒士阶层对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融合的日渐加深,确实为宗教儒学化改造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人才储备。后来虽然经过西汉元帝、成帝等几代皇帝的不懈努力,一直到东汉末年也没能够创立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儒教,但是一个粗具儒学义理的国家宗教雏形还是形成了。这种国家宗教在服务和安定政治秩序目的的支配下,不仅对汉室的庙祀和郊祀有着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官吏的选拔、察举和辟征等,也都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标准。这样一来,虽然为儒士身处枢要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仕进的路径趋于单一,致使一些贵族富人干仕无门。干仕无门的贵族心间自然充斥着无法排解的苦闷,他们需要道释这两根救命稻草。儒释道题材的汉画和铭文告诉我们,在调节宗教与权力关系的过程中,统治集团虽然可以依据某种价值体系构建合乎自己政治需求的规则,但这种

规则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强调宗教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宗教为身心服务的功能。当儒教不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或不能完全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时,信众都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它的限制进行超越。从汉画来看,依靠政治力量来对宗教实施压制,并不能真正减低人们多元的宗教需求热情,宗教垄断更不能迫使主流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消亡,被压制的宗教照样会顽强地生存下去。在皇权支持儒教进行信仰垄断的特殊环境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其实很难真正实行,即使勉强推行也很难持久。如果官府提供的宗教品种和宗教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时,信众就会纯粹出于心理满足的需要而远离主流宗教,从而增加官府管理的难度。

## 二

宗教高压和极端管制不改变人们信仰的内容,只改变信仰的方式。当主流宗教以外的宗教受到打击、限制,信徒为降低风险,就会采用既合规又违规和既违规又不违规的方式来搭建自己的信仰世界。

从汉画来看,汉代信众这种只改变信仰形式而不改变信仰内容的行为有这样两种类型:

第一,以不违规的形式传播被官府禁毁的宗教。董仲舒神化儒学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强化君权,其思想对汉代的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教一直是汉代政治文化的底色。当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尽管有像安息僧侣安世高、天竺僧人竺朔和大月氏僧徒支娄迦谶等不远千山万水于桓、灵之朝陆续前来译经弘法,但由于儒、道二教的诋毁攻讦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致使其传布精义和扩大善法影响所必需的译事、法事无法正常开展。《高僧传》云:“大法初传,未有归信,蕴其深解,无所宣述。”<sup>[7]105</sup>这种局面和业已边缘化的道教加在一起,颇令一些心志与道释暗合之人感觉不适。他们虽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与道释辨察会通而不愿自拔,但是,早期道教与官府对抗的巨大风险和早期佛教所承受的磨难困苦使一些人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更不愿意为追求所谓的宗教理

想而牺牲身家性命。针对佛教在中土发展所受到的一系列诟病和责难,朝廷虽然颁布有不许出家的禁令,但是,在府第宫阙绘制佛像或设立佛堂,虽然具有传播佛教信仰的实质,但因不涉及出家剃发绝嗣问题,谁也不能将它跟行为违禁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明帝就在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公开绘制过佛像。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明帝所图绘的佛像一直到唐代,还有“存者”,并“可见矣”。又据《后汉书》记载,明帝的胞弟,楚王英在明帝求法后便道佛杂处,“信其术”又不设明确的边界,敬老的同时还礼佛。桓帝时,为设华盖事祠浮屠老子,“悉毁诸房祀”。古代文献所反映的这种信徒相互礼敬互通道场的信仰行为,在出土汉画中也有充分表现。如刻凿于明帝永平四年的孔望山摩崖佛像群中,既刻绘有穷道真仙圣的典型黄帝和老子,也刻有表现佛教教理教义的涅槃图、舍身饲虎图和手持莲花的光头佛像。在沂南东汉晚期画像石墓的八角形擎天柱上,东西两个侧面分别刻绘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内容,而南北两个侧面则分别刻绘了佛教中的菩萨图像<sup>[10][157]</sup>。人们的这种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行为跟明帝如出一辙,虽然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成分,传播了相关的宗教,但又巧妙地规避了有关禁令的制约。这种为了宣泄个人的宗教情感而刻意从事的所谓打擦边球做法,虽然对于传播教义、凝聚信徒而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不够稳定,所以容易导致宗教局势的复杂化,增加管理难度。

第二 跟官府冲突可以预见的高昂代价迫使大多数信徒退出跟官府对抗的序列,面对官府对儒教以外宗教的严格限制以及儒学所提供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缺少吸引力的现实,很多人就会以极大的创造性在宗教表达和宗教消费方面去另寻出路。汉画表明,严厉的管制和残酷的打击并不一定能够降低人们对于宗教的热情。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好些时段,道教都受到过官府的严酷打击。特别是西汉的成、哀和东汉的桓、灵诸帝时期对早期道教打击最为惨烈。如西汉甘忠可、夏贺良、李寻、解光等先后被成帝、哀帝等以“反惑众”、“乱政罔上”的罪名治狱流放,东汉善方术的赵炳也遭官府“收

杀”。在这风雨如晦、波谲云诡的险恶环境中,表面上的道教活动在全国各地似乎都有所收敛,但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崇拜却达到了极其狂热的程度(西王母成为道教的至上神是魏晋时期的事情),人们通过传递西王母“符信”的方式来实现对宗教数量减少条件下人们宗教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补偿。早期道经从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太平出发而创设的灾异解除学说虽然遭到了官府的否弃,其代表人物尽管也先后罹遇了这样那样的人生苦难,但是,这些学说的影响并未从社会中完全消失,而是以潜流的形式跟西王母信仰糅合在一起,在民间秘密地绵延发展着,特别是与东汉后期危机说、更命说合流之后,以传言方式对汉代的社会政治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所流行的西王母传言中,人们都是把西王母当作能消弭天灾人祸的吉神来对待的,认为只要有西王母在就意味着能够度厄消灾、逢凶化吉。由于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导致民众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怖不安的状态之中,惊慌失措的记载在文献中层出不穷。但是从《汉书·五行志》、《汉书·天文志》、《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孝安帝纪》中看到,无论是成帝时的“京师相惊”,哀帝时的“民相惊动,讙哗奔走”,还是王莽时的“民人骚动”和安帝时的“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最终都是通过祭祀西王母或传递西王母“筹”这种形式来平息的。西王母作为一个具有除疫病定死生神通的吉神和福神,理所当然地成了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一残酷生存环境中人们心灵深处的救星。这些此伏彼起的所谓“讹言”、“妖言”、“流言”和在墓中刻绘西王母图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求。汉墓考古发现,在汉代这几个崇拜西王母的时段,汉墓里刻绘西王母画像的现象跟文献所记载的一样,繁多而普遍,全国各地均有大量出土。为示敬重,人们不光在传言中给西王母敷以神通广大的风采,而且在汉画中也常常让她居于正中位置。如果画面分层,西王母画像一般都被设置在第一层的正中。山东微山两城乡出土的汉画中,西王母端坐于悬圃之上,一男一女持便面侍立两侧,榜题刻写“西王母”3个字<sup>[11][14]</sup>。南阳熊营出土的西王母

汉画像中,西王母在乘鹿仙人、三青鸟和玉兔的簇拥下神气活现地端坐于画面正中。因为西王母寄托着人们的希望,所以好些墓室里刻绘的还不止一幅。如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中至少出现有3幅西王母画像。前石室西壁画像共有3层,西王母端坐在第一层正中的蛟龙椅上,两侧有玉兔、蟾蜍和奇禽异兽。左石室西壁画像分为3层,西王母端坐在第一层正中的榻上,捣药玉兔、手执针砭的人首鸟身神异和翼龙侍奉于四周。左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画像为2层,上层刻天空内容,下层刻西王母和东王公端坐于云上,周围刻男女侍者<sup>[12]28</sup>。山东滕州桑村镇户口村汉墓出土西王母画像2幅,第一幅为线刻图,画面5层,西王母凭几端坐于第一层,其右题“西王母”3个字,周围为人身蛇尾侍者<sup>[12]73</sup>。另一幅为减地平面线刻,画面8层,西王母居第一层正中,左右为人身蛇尾的侍者持便面服侍<sup>[12]76</sup>。在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墓出土的汉画中,西王母画像凡两处,均处于画面中的醒目位置。这种“万民皆附西王母”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使很多人从中获得了宗教情绪的宣泄和宗教心理的满足。宗教管制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宗教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给宗教管理增加难度的同时,也暴露了宗教管制效用的有限性。宗教需求方在宗教品类消费上所呈现的这一特点,是现行宗教经济理论所没有关注到的。

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sup>[13]23</sup>汉画是古人自己给自己用符号创造的一个象征世界,它隐喻着具体的宗教感情。官府对于宗教的限制打击和官僚贵族的参与虽然使汉代的宗教活动和信仰行为变得头绪驳杂,但从古人留存在汉画中的情感世界来看,宗教管理如果只是一味地依仗权力,强化堵截而忽视疏通的话,那么就很难有效地降低人们的宗教热情。在权力打压限制的缝隙中,信徒总是千方百计地以其不合规又不违规或既合规又违规的策略跟官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明争和暗斗。要深入系统地把握早期宗教的整体状貌,不能忽视信众的这种行为和智慧。

西汉后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触目惊心,豪强地主的强大势力也是统治者心中一块久抹不去的心病。在历史教训和现实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光武、明、章等帝都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完备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对众多功臣大肆实施封侯封地,但在政治上却不给以实职实权,并剥夺他们的兵权,而且不许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大肆并县和废除内郡地方兵力,使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这样,虽然得以维护了统治,但因此而导致的宦海险恶冲击波,不能不使贵族士大夫对于仕途和世事产生一些别样认识。桓、灵之世两次“党锢之祸”,大批士大夫惨遭杀身之殃。这种严酷的现实不仅将传统的价值观念击得粉碎,政治参与的忧惧体验所带来的心灰意冷坚冰,更迫使一些人走上了“朝隐”或“退隐”的道路。再者,东汉后期灵帝置办鸿都门学开价卖官,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昔日所开辟的察举、征辟入仕道路,给社会蒙上一层焦虑、迷惘、忧忿的情绪。毫无疑问,汉画为贵族自己出钱所刻造,所有画面都真实直观地体达着墓主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取向,我们从墓主将希望寄托在和谐自由的天国而非通常的现世和君恩这一点上,即可看出这些汉代贵族富门对于所处时代所持的深深失望态度。汉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全国出土的汉画中,刊刻皇恩或忠君思想的汉画不曾见到一幅,而表现道教佛教教理教义的画像却蔚为大观。这种理茧于断丝、缀义于纤线的汉画艺术实际已将人与天、地、神诗意交通的审美理想跟人遇到不如意时特有的精神超越本性联系在了一起。由于汉家政治日益颓败,世风堕落和僭凌横姿、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人命危浅,使人们在沉重的自省中对佛道的清静境界十分向往。他们认为,在忧馋畏祸失意的心境中,只有“宁静”才是灵魂的温馨港湾。这个“港湾”,“具有相当的心理慰藉和心理暗示作用,并因此实际影响着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生活中有些问题不是技术或组织手段所能圆满解决的,那么通过对神秘力量的祈求、控制、利用,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给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对于增强民众信心、

调适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效的。”<sup>[13]31</sup>古人这种刻绘汉画以佛道二教虚幻景象来麻痹神经的做法,既是对身份处境的哲学叩问,也是对价值命运的诗性评判。这种将宗教信仰纳入墓室所构成的特殊的丧葬文化,乃是汉代历史时期特殊宗教政策下儒教无法满足世人宗教信仰需要和人们无视儒教威权的深刻表现。

### 三

人乃有心之器,宗教需求是民众精神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长期被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从汉画来看,官府对宗教管制得越严苛,教团与官府的斗争就越惨烈,信徒宗教行为的潜流奔涌得就越凶猛,堵截起来也就越困难。因为越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的精神就格外焦虑,怨气也格外多,对官府的宣教就越发反感。在早期道教与官府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期间,当许多自称将军、黄帝跟官府对抗的人惨遭诛戮之后,信徒按说理应有所惕怵,信仰也应该有所动摇,但事与愿违,一些人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且仍然坚持暗中修炼。张力是宗教经济理论用来考量宗教组织与其嵌入的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一个词汇,指一个宗教群体与外部世界的区别、分离和对抗程度<sup>[14]20</sup>。它认为,信徒付出的物质、社会和心理代价越高,宗教组织的张力就越大,信徒对于宗教组织的依附程度就越高,社会越动荡相关宗教越能够快速发展。在官府每一次打击道教、试图用种种政治暗潮冲销早期道教的运作程式和积储逻辑的时候,张力和道教天赋的理性就会驱使信徒勇敢面对官府的严刑峻法,不轻易放弃业已承担的诅咒时政重任,还促使教徒按照道教教理教义相融合的要求,在道教的阐释系统中自觉追溯道教的思维模式和知识谱系之文化渊源,积极宣扬道教那丰富多层的哲理内涵。从安帝永初三年“海贼”“将军”张伯路,到顺帝阳嘉元年“妖贼”“将军”章何,从桓帝建和元年“黄帝”李坚、建和二年“黄帝”裴优、“真人”管伯到灵帝中平年间的“三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每当这些以道倡乱的“妖民”被徙边、下狱、诛杀、弃市和

当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被官府诬为米贼、蛾贼,深得真人“敬信”的张鲁政权被曹操讥为“妖妄之国”,五斗米道的原始平等思想被官府贬为“三张伪法”,太平道惨遭镇压时,不光社会上炽盛的道风热浪扑面,汉画也不甘寂寞,对于道教教义和神祇也总是处在狂热的巅峰。纳祥避凶为准的,主流教化为折中。从目前出土道教题材汉画那昂然挺出、欣然承受的气概上,可以明显看出信徒在有意无意之间自觉与不自觉地表达与官府不相一致的宗教情感。不仅考古工作者在曹操宗族桓帝延嘉七年墓中发掘了一块刻着“祭酒”、“苍天乃死”字样的字砖<sup>[15]</sup>,而且出土汉碑上也有很多关于道教跟官府对抗的刻辞。如灵帝中平二年郃阳令曹全碑载“妖贼张角兵起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寰不安。”<sup>[16]1771</sup>灵帝中平三年汤阴令张迁碑载“黄巾初起,烧平城市。”<sup>[16]1813</sup>献帝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敏碑载“米巫凶虐,续蠹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sup>[16]1896</sup>这些碑文站的虽是官府立场,但它真实地记录了道教徒在遭受官府打击时所进行的生死对决情况。

就在道教处于全盛状态、政教关系日趋紧张的东汉后期,通过对河南、山东、江苏、陕北、四川等地汉画中道教内容统计,可知汉墓对表现道教相关义理画像的使用不仅没因官府对道教的严禁而减少,其数量和种类反而呈现出一种显著增加的特点。信徒对于早期道教所持的这种推扬与敬仰心态,固然有道教对政治情势的误判铤而走险的成分,但不能说它没包含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是非取舍。由于人们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心理学所说的过滤性选择的认识阶段,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只期待他们渴望发生的。因此,道教此时横遭禁断的非常处境,为道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机遇。贵族豪门的墓室的装饰上,云集了大量以早期道教教义、故事和传说为题材的画像、榜题和题记。伏羲女娲的故事产生于战国以前,《列子》中即有了人面蛇身的描述,后被道教经典尊为“上圣人”大神。因其顺阴阳的教义和教理在汉代具有很大影响,所以伏羲女娲交合的图像在全国汉画中刻绘得也最多。如山东嘉祥武氏祠建于桓帝建和



二年,其左石室后壁小龕西侧刻三层画像,伏羲女娲分别手持规、矩居于第二层,旁有2个羽人举手相牵<sup>[12]26</sup>。又如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建于桓帝和平元年,其墓室门侧刻2层画像,上层为云气纹、四鱼云车,2个羽人,伏羲女娲居下层,人首龙尾。<sup>[17]78</sup>这些画像风骨清爽,元气酣畅,从其出现的位置来看,显然在于导达对于道教的敬仰之情。汉代好道之人信奉羽化升仙,在变化飞升过程中充当架起天地和神人之间桥梁工具的神禽异兽,从汉画来看,不仅有龙、凤、鹿、虎,还有天马、飞廉和仙鹤。龙图腾崇拜,原本在汉代前就已出现,但到了汉代,具有了驾乘升仙的意蕴。四川芦山王晖石棺造于献帝十七年,石棺左侧刻青龙,作飞腾状<sup>[18]15</sup>。徐州茅村汉墓建于灵帝熹平四年,画像上层为双线十字穿壁图,下层刻神人乘龙图,2个神人乘于龙背,仙人引路,猛兽开道,自由的升仙观念凭借苍龙的飞腾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鹿温驯敏捷,古人认为它常伴仙人左右,是人实现成仙愿望的瑞物。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门侧画像的周边为蔓草状勾连云气纹,中间为鹿车,车乘一人,作向前奔腾状。<sup>[17]78</sup>南阳出土的“仙人乘鹿”画像石上,仙人手执仙草,主人神情悠闲地乘坐于鹿背,于云气升腾中飞行在升仙的路途上。虎乃御凶食鬼的百兽之王,在古人眼里,它是最能助人升仙的吉兽,南阳麒麟岗出土的“虎车”画像石上,三虎并架一车,风驰电掣般拖着二人向仙境进发。天马、飞廉都是古人眼里难得的驾乘升仙工具,在南阳、徐州、四川等地均有大量出土。这些画像都充满了升仙的喜悦和欢乐,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自由的洒脱状态。道教符号在东汉后期的墓葬中也有广泛刻绘,如具有镇墓避邪作用的双结龙符号,在灵帝熹平年间长宁七个洞5号崖墓中就有所刻画,除刻画单纯的双结龙符号外,有的汉画像石上还用文字的形式记述了双结龙图案的功用。如在山东苍山桓帝元嘉元年画像石墓中,对双结龙符号不仅有着明畅剖切的刻画,而且还用题记的形式说明了刻绘这种双结龙符号的作用“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殃。”<sup>[19]</sup>道教是用来表示阴阳和谐的玄武符号,在长宁七个洞东汉晚期1号崖墓画像中就出现了5处,在南昌

东汉晚期墓的画像砖中也出现了1处<sup>[20]</sup>。仙人,也叫羽人,在道教中指长生不老且有种种神通的人,东汉后期的汉画墓中刻绘很多,有的1幅,有的多达数幅。如徐州市茅村汉墓中室南壁最上层刻2个捣仙药的羽人。山西中阳县道棠汉墓建于桓帝和平元年,墓室立柱正面刻“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安集掾平定沐叔孙□舍”,主柱两个侧面各刻2个仙人<sup>[17]84</sup>。山东嘉祥武氏规模宏大,画像众多,仙人刻绘得尤其多。如左石室西壁上层刻绘很多仙人和捣药的玉兔等。前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画像共分4层,每一层都有好几个羽人在助人升仙。左石室后壁小龕东侧画像为3层,第三层中间一个身缠巨蛇者卧于地上,上有羽人、蛇等。以上这些事实说明,在早期道教的初传时期,尽管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早期道教遭受了一系列严酷的打击,也尽管汉朝历代法例中都有针对信仰道教妖言而设的问斩和灭族法例,但是,这种苛刻的刑罚并没有阻断早期道教的流布和发展,一些甘愿为道教而牺牲的殉道者义无反顾的执着极大地增强了其他人皈依道教的信心,为道教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甚至促成了旨在推翻汉家王朝的黄巾起义的爆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中,挺刃而前的信徒,不知凡几。信徒前仆后继的精神本是由道门教诲固结所维系,更是由大法的承复报应思想润泽而成就。汉代后期那险恶的环境、危浅之人命,使官府和民间无不希长生成仙,无不重爱身养生。道教的房中术之所以被汉代人视为修仙不可或缺的入门之阶,是因为此术能帮人夺天地造化之功来返老还童。道教内丹炼养理论认为,年龄越大真元越漓,消耗越多衰老越速,此时只有通过男女交媾秘戏吸收对方精气的方法予以补救,才可以重新回到精满、气足、神旺的“三全”状态。道教中的许多神仙,如素女、彭祖等,都是凭善修此术而证道长生的。汉画中的著名神仙黄帝也不例外,马王堆房中术帛书中就有黄帝热衷房中术的叙写。汉代宣扬房中术的道派,先有涓彭派,后有容成御女派,影响都很大。讲求发欲和勿泄多交是房中术的要点,“务先徐徐嬉戏,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接。弱而内之,坚强急退。但接而勿施,能一日一夕数十交而不失精



者,诸病甚愈,年寿日益”<sup>[21]10</sup>。因为男精女精在一日之中的消长正好相对,所以通过互相渗透和转化的方式可实现互补互养,故而要求多交。发欲的目的在于使男女欢乐动情,“体皆乐痒,悦恻以好”,在快乐圆融中交合利于“排出阴气,充实阳气”,从而使阴精和阳精处于和合状态。道教贵生重生更乐生,认为将生存的质量提高到神仙一样的快乐境界,就是所谓的“得道”。毫无疑问,当进入早期民间道教的系统去表现房中术时,汉画内容的刻绘总是与相关义理和时代潮流圆融契合、遥相呼应的,它对房中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使它对所刻图像的意蕴风貌和价值取向不会跟房中术彼此错出而只会形义会通、发潜阐幽。四川彭山崖墓画像中,一对男女裸体并坐,肘腕摩挲,肢体勾结,丰乳肥臀的女子左手搭在男子肩上,男子手绕过女肩抚乳,二人脸部相贴作亲吻状<sup>[22]</sup>。四川荣经陶家拐汉墓石棺上的嬉戏图,表现的也是男女爱抚接吻内容<sup>[23]</sup>。此类图像在四川乐山、泸州和山东邹城、安丘等也已发现多处,说明交前嬉戏在当时相当流行。房中术是一种讲究不泄多交以养元气的长生方法,在汉代能行此术的道士大有人在,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冷寿光、甘始、封君达等人因行“容成御妇人术”,年岁均至二百以上,更有人认为“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sup>[5]128</sup>。由于房中术被看作是最切实有效的升仙方法,所以直接表现交接的画像在汉代也比较多。如山东平阴孟庄汉墓前室西侧立柱自上而下刻2幅画像,上为男女交媾场景,下为男女相互搂抱正在交媾的内容。徐州贾汪汉墓出土的交媾图上,一对男女正忙于交媾,另一男子手执自己硕大坚挺的阳具在旁边热切等待。陕西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男箕坐于地,女跨股而交。新都出土了两块表现该内容的画像砖,情节大同小异。一对裸体男女在树下交接,男上女下,女双腿高抬置于男肩之上,身后和大树下各有一男手扶勃起的阳具在一旁等待<sup>[24]</sup>。与此类似的是彭县也出土了这种内容的画像砖,只是地点被放在了帷帐之中<sup>[25]50</sup>。有的画像砖还曲终奏雅,在像旁模铸了“黄妳能前后并御两大阴子”之类的文句<sup>[26]</sup>,宣扬和箴诫多交强身以致仙的用意相当

明显。这些精美手笔,颇悦人耳目。老子之所以能成为长生不死的真人,《列仙传》认为是老子“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的缘故<sup>[27]17</sup>。葛洪对此曾不无感慨地说“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sup>[28]40</sup>贵生思想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教义,这些合体相交的图像表现的是人的生生本性,细腻的描绘中透出一片震撼人心的理性光芒。学理凝重,无远弗届。汉画所记录和表现的一切,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时代之于道教探索生命奥秘理念的全面凸现,这种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选择和诠释,既是信徒在特定时空情景下宗教动机、诉求、期望、想象等心潮的表达,更是宗教管制下宗教信仰本身天赋质性吸引追随者和提高信众委身程度的必然表现。除此之外,这种对抗行为还表现在日常的祭祀仪式中。如太一神原本是楚地宗教信仰中的至尊大神,在汉代中期以后屡屡遭受儒家排斥和打击。但由于刘汉统治集团跟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所以贵族阶层都对儒教的陈词滥调置若罔闻。特别是武帝为长寿升仙在谬忌等人谀词媚语的蛊惑下重建太一(也作泰一)之祀且被成、哀诸帝踵事增华之后,太一便被尊为汉代宗教信仰中的至上神,地位远远高于五帝而受到全天下的顶礼膜拜。走上神坛之后,不仅西汉中晚期流行的阴阳、数术、兵占之类的书籍皆以太一命名,如《泰一阴阳》、《泰一杂子十五家》和《太一兵法》等,而且墓室中也刻绘有大量奉祠太一的画像。如洛阳汉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太一神像,武氏祠后室第四石下层的太一神像和西安交通大学附小汉墓圆形天象图中彩绘的太一图像等。可以肯定的是,刻太一之像即为敬太一之神,皇室豪门的这种行为无论是从情理还是从规矩上看,都是与当时儒家大一统的宗教观念格格不入的。这些人虽然在相关的宗教消费中得到了宗教情绪的宣泄,但使相关的信仰活动带上了对抗的色彩。

综上所述,汉画墓葬的装饰内容是驳杂斑斓的,既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性宗教的内容,也有儒释道等学理性宗教内容,更有传统的方术性宗教的内容。这些内容杂糅一团同处一墓,虽然因视点宽泛、意旨深厚,给我们今天的科学界定和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有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汉代信徒群体是巨大的,心针是绵密的,他们所需求的宗教品类也是极为繁复和极为不稳定的。作为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的隐喻,人的本性通过对早期宗教这种领受而得到彰显。信徒这些宗教行为是面对大一统专制权力所提供宗教品种不能满足需求时所作出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虽然导致了汉代宗教的混乱化和复杂化,但正是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无序状貌,以及貌似呆板重复的格套,埋藏着信徒内心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和对于相关宗教义理的认同情感。汉代信众这种生活意趣与宗教风范贯通统一的独特实践,在为我们提供多元多维视角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宗教自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为政者的重要职责是理顺影响宗教运行的各种关系,及时消除宗教的二元结构和解决宗教信仰的灰色地带问题,使它们在良性互动的环境中得到公平的竞争和自由的发展。只要各种宗教都处在一种理性化的发展状态,社会也就容易保持稳定和谐的局面。如果满足于使用妄加刑罚的政治权力,一味地拉抬和排斥某些宗教,使宗教的运行机制处在极度的扭曲之中,那么就会造成宗教关系紧张,社会也会因此而出现各种祸乱。汉画及其铭文所展示的信徒的宗教行为业已证明,官府假借高压堵截和禁严罚重的管理方式不仅造成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断裂,妨碍宗教的正常发展,而且收到的管理效用也极其有限,容易导致地上地下教群在病态中生存,无助于固化外、多元通和宗教信仰基础的构建。

#### [参考文献]

- [1]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汉]杨雄.太玄赋[C]//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晋]常璩.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
- [4] 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J].文史哲,2011(2).
- [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王育成.洛阳延光元年朱书陶罐考释[J].中原文物,1993(1).
- [7] [梁]僧祐.弘明集[C]//四部丛刊初编(第8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 [8] [梁]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9]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0] 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C]//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1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2.
- [12] 中国汉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汉画像石全集(1)[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 [13]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14]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5] 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J].文物,1978(8).
- [16] 徐玉立.汉碑全集[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 [17] 中国汉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汉画像石全集(5)[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 [18] 中国汉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汉画像石全集(7)[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 [19] 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J].考古,1975(2).
- [20]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南昌市南郊汉六朝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6(3).
- [21] 丹波康赖.医心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 [22] 唐长寿.荣经画像石棺“秘戏图”及其它[J].四川文物,1991(1).
- [23] 李晓鸥.四川荣经发现东汉石棺画像[J].考古与文物,1988(2).
- [24] 高文.野合图考[J].四川文物,1995(1).
- [25] 迅冰.四川汉代雕像艺术[M].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
- [26] 孙太初.梦雨楼金石文字跋[J].云南文物,1984(15).
- [27] 邱鹤亭.列仙传注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 [28] 胡守为.神仙传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编辑 王桃 责任校对 吴奕琦]

Shenzhen 518053, China;

2.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ourist experience stud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 in tourism research. This paper defined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s the subject well-being in tourism context. Psychological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tourist experience structure. Literature review, focus group and open questionnaire are us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ill be applied to the formal survey. Data from 435 customers of a famous travel agency in Guangzhou are collected, based on whic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re employed to develop 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 experience includes solitary experience, peak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experience, which form a Lam-karyotype model. Solitary experience is the base of the model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 with the feeling of lonely and unsafe away from familiar circumstance. Peak experience is on the top of the model which is a perfect status when a tourist achieves self-fulfillment and self-surpass. Achievement experience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model which comprehends peac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and even the remembrance after travel.

**Key words:** tourist experience; subject well-being; structure model

### Study on Incentives to Local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the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GUO Chun-fan

Management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Property Trust” is an effective pattern to develop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It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hree tasks in the development: operating, protecting and making rich. By building the model of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we study incentiv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We shows that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reduce the motivation to the operating achievement, and they should meet the threshold condition when exci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rotecting and making ri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put the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local economy promot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d focus more energy on protecting and making rich with increase of the tourism income.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ncentive System

### Control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Multiple-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n Society Powers of the  
Han-dynasties Show in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LIU Ke

Literature School,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in Han-dynasties, there are a set of Portraits and Inscriptions relating religion, which provides precious materials for us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ple-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rly religion, society powers. The materials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ligion control and development, also explain that religion meets people's spirit needs.

The high religion pressure cannot change people's content of faith , just the mode. when the Confucianism cannot meet the people's demand , Believes tries to surpass the control with special methods.

**Key words:** unearthed artifacts; religion control; faith mode; religion relationship

---

**Dealing with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ese Government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during the Reclamation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Macau**

ZENG Jin-l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 Macau ,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had affected urbanization of Modern Macau. Since the Opium War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Chinese villages and land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Macau were developed slowly by the Portuguese Macau Government. At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Portuguese Macau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blueprint to build a large artificial harbor , and reclamation at the northern part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However , its reclamation attracted protest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ed to a six-year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 governors of Macau and Portuguese foreign ambassadors took extremely flexible diplomacy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using the situation of North-South division , and such diplomacy helped the reclamation at northern part to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Key words:**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hip; Guangzhou military government; Beijing Government; North-South division; reclamation; urbanization; Northern part of Macau

[责任编辑 丛 敏]